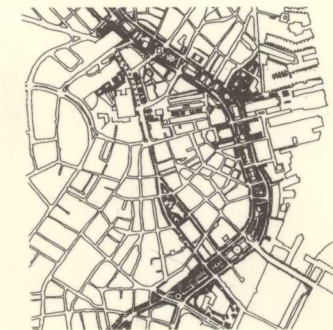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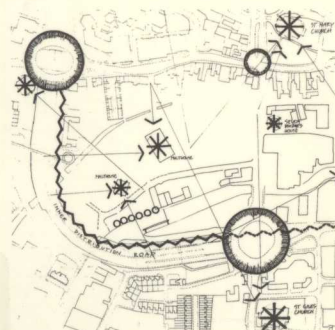


国外建筑设计译丛

设计与场所认同

[英] 乔治娅·布蒂娜·沃森 著
伊恩·本特利
魏羽力 杨 志 译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国外建筑设计译丛

设计与场所认同

[英] 乔治娅·布蒂娜·沃森 著
伊恩·本特利
魏羽力 杨 志 译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01-2008-4119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设计与场所认同 / (英) 沃森, 本特利著; 魏羽力, 杨志译.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9
(国外建筑设计译丛)
ISBN 978-7-112-11597-6

I . 设… II . ①沃… ②本… ③魏… ④杨… III . 建筑设计
IV . TU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10921 号

Copyright © 2007, Georgia Butina and Ian Bentley.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first edition of Identity by Design by Georgia Butina Wast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ELSEVIER LTD, The Boulevard, Langford Lane, Kidlington, Oxford, OX5 1 GB, England.

The moral right of the author has been asserted
Translation © 2009 China Architecture & Building Press

本书由英国Elsevier 出版社授权翻译出版

责任编辑: 程素荣
责任设计: 郑秋菊
责任校对: 王金珠 刘 钰

国外建筑设计译丛

设计与场所认同

[英] 乔治娅·布蒂娜·沃森 著
伊恩·本特利
魏羽力 杨 志 译

*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郊百万庄)
各地新华书店、建筑书店经销
北京嘉泰利德公司制版
北京云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

开本: 787×1092毫米 1/16 印张: 18 字数: 432千字
2010年3月第一版 2010年3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 58.00元

ISBN 978-7-112-11597-6

(18866)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本社退换
(邮政编码 100037)

致 谢

如果没有世界各地人们的慷慨相助，本书可能永远也无法写成。一些人为特定的案例研究提供了信息，另一些人对共同完成整个计划至关重要，我们应感谢他们。

很多当地人丰富了我们特定案例研究的理解，没有他们的远见，我们可能永远难以打动游客。我们特别想要感谢如下人物：布拉格的 Michal Hexner and Jiří Štursa；卢希尔雅那的 Richard Andrews, Stane Bernik, Peter Krečič, Vesna Grunčič -Vedlin and Braco Mušić；关于伦敦地铁是 Bob Langridge；墨西哥的 Diego Villaseñor, Ricardo Legorreta, Teodoro Gonzalez de Leon, Carlos and Lisa Tejeda, Cecilia Martinez de la Macorra, Ana Maldonado Villaseñor and Luis Gabriel Juarez；博洛尼亚的 Pier Luigi Cervallati, Gianfranco Caniggia and Nicola Belodi；佩鲁贾的 Lucia Vašak and Fabrizio Fiorini；马来西亚的 Jimmy Lim, Mijan Dolbani and Bayo Bayudi；波士顿的 Eric Schmidt and Dick Gavers；在响应环境的设计途径方面，有 Paul Murrain, Ivor Samuels, Richard Hayward, Sue McGlynn, Graham Smith, Mariana Castaños, Dora Boatemah（令人伤感的是他已在本书完成前去世），Thomas Esterine 和布莱克斯顿的安吉尔镇居民。我们非常感激他们。还有以下机构对图片的贡献：Asia Publications, Concept Media, 波士顿再开发局，景观设计杂志，MIT 出版社，波士顿国

立图书馆托管人，Verso 出版公司，Edizioni L'Inchiostroblu, Tachen, Electa, Arcadia, Institut Masyarakat, Escala, The Monacelli Press, Thames and Hudson, Birkhauser Verlag AG, Studio Vista, Rotledge, Uiverza v Ljubljani 和 Foulis 出版社。

然而，一本书的产生并不仅仅是心智探讨的事情，而且它也包含了大量艰苦的实践工作。对此，我们也应当致以谢意，尤其是 Jane Handal, Jessica Keal, Catherine Smith, Maureen Millard, Linda New, Regina Mapua Lim, Anwar Puneekar and Mario Reyes。没有他们，我们将无法完成此书。

最后，任何长期计划都需要不断的挑战和鼓励才能发展下去，《设计与场所认同》也不例外。我们知道应有多少归功于他们：David Watson, Iva Bentley, Christina Dorees，以及所有推动我们在第一时间发展这些想法的学生们，还有城市设计联合中心的支持。

乔治娅·布蒂娜·沃森
伊恩·本特利

目 录

致谢.....	V
导言.....	1
第1章 布拉格：民族认同的追求与危机.....	17
第2章 普雷尼克的卢布尔雅那：个人愿景的社会关联.....	43
第3章 墨西哥：文化与景观的复合.....	71
第4章 伦敦地铁：一路为人人.....	101
第5章 红色的博洛尼亚.....	127
第6章 罗西在佩鲁贾：历史分层的设计方法.....	155
第7章 马来西亚：生态与文化的层叠.....	181
第8章 波士顿：翡翠项链的强化.....	209
第9章 综合的开始：响应环境的设计方法.....	237
结论.....	261
参考文献.....	273
译后记.....	281

导 言

当今，世界各地的许多人都似乎觉得一个场所应该有其特征——“认同”（identity）是最常用的词——来使它有别于其他场所。故事曾经就是这样进行的，由于大部分建筑产生于乡土过程，地方与地域认同感的形成不需要任何人去努力实现。至少在19世纪前，交通的限制保证了世界各地的大部分建筑源于用当地的材料建成，而对结构原则和建造技术的有限理解把建筑类型的范围限定在任何特定的地方。当然，我们不应夸大所有这些稳定性，在很多地方，尽管这些限制都存在，激进的设计变革仍时有发生。当英国的考茨沃德山（Cotswold Hills）上适于建设的木材消耗殆尽时，工匠们开始采用新的方式，建造出石头房屋，这一地区现在因此而闻名（图0.1）。然而，即使地方特色受到如此激烈的变化影响时，这些变化本身也并非主要通过选择而形成，而是由于建造者所面临的新的限制，其性质仍旧是地方的。

工业化使这些地方限制日益松弛。19世纪中叶在世界上正在进行工业化地区，相对廉价的运河和铁路交通意味着建筑材料这样的东西可以有更加广泛的来源。科学进步带来了技术潜能的爆发，扩大了这些新得到的材料的用途。新的设计思想利用这些潜能，通过设计图书与期刊数量的

不断扩张，以及设计师人数的不断增长而得以传播，现在他们发现跨越更广阔的地理范围来工作更为实用。在快速工业化的城市化年代，用来控制公共健康和安全的新的条例与法规也为了可预测的生产而寻求共同的执行标准，这同样侵蚀了地方和区域的本土差异。经过了一个多世纪的变迁，具有地域特色的建成形式不再能够自发产生了。任何一个人细想一下都清楚：正如建筑师M·霍夫（Michael Hough）所指出的，“地域特色的问题变成了一个选择的问题，因而是设计的，而非必需的”。¹

现在任何行业的人们似乎都对此特殊问题饶有兴趣。例如，查尔斯王子为了增进对场所—认同（place-identity）的特定理解，忠告设计师们要“使其所在成其所成”（Let where it is be what it's made of）²。反体制（anti-establishment）^[1]的艺术家露西·里帕德（Lucy Lippard）虽然具有非常不同的价值观，但至少也同意场所—认同的问题，她赞美“地方的诱惑”，提倡一种“融入/或照亮场所”³的艺术。这种感情的广泛传播也使她在选民中得到了可观的政治力量，因此如今在世界很多地方，场所—认同的问题已吸引了主流政客们的注意。例如新加坡议员Hong Hai对“新加坡有时将构成人们的根源与传统的建筑和场所弃若敝屣”

[1] 反体制（anti-establishment），一种反对社会、政治、经济惯常原则的观点，多见于社会和政治议题。在英国反体制组织多为反对统治阶级。——译者注



图 0.1 考茨沃德的乡土建筑

之事深表遗憾。⁴ 场所—认同感现在如此广受重视，也突出体现在经济上。如今它已变成了全球范围内的热销商品：通过“独特卖点”（Unique selling proposition），地方性在现今全球最大的产业中被市场化为旅游目的地。“寻找特色与不同之处是旅游的全部意义”，M·霍夫提醒我们说。⁵

面对这些与日俱增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压力，许多设计师如今希望在他们的工作中涉及场所—认同的话题。例如在英国，环境部 1996 年的研究⁶ 显示各种专业领域的设计者们已经开始认识到这一议题的重要性；皇家城镇规划学院前院长 T·罗伯茨（Trevor Roberts）2002 年提出认同感是“规划的基本目标”。⁷ 这种关注并非仅仅是英国文化中特有的怀旧方面，它在地理上传播得更为广泛。将这一关注应用于非常不同的，也许是更加面向未来的文化语境中——比如马来西亚——B·贾尔斯（Bob Giles）就强调了“当地政府对民族认同的

渴望”在建筑中的重要意义。⁸

从这些例子中可以明显地显示出，对恰当的地方和地域认同的广泛追求不能仅仅视为一件毫无疑问的“好事情”，设计思想家们指出其消极方面也没什么坏处，其中两点尤其重要：首先，场所—认同的概念和极端右翼的政治思想关系久远。例如人们在纳粹意识形态中想到了“国土”和“祖国”的作用。其次，场所—认同感在实践中常常被约简为一个在市场上买卖的简单商品，成为日常生活迪斯尼化的一部分。N·利奇（Neil Leach）很好地总结了这一孪生的危险，他提出“我们在地域主义中认识到的可能不仅仅是一切呼唤地域或民族认同感中内在的潜在危机，而且是这一概念在晚期资本主义文化条件下潜在的复杂性。”⁹ 危险当然存在，但我们并不把它作为在设计中解除场所—认同的论据。实际上，恰恰是普遍愿望和内在危险的强硬结合使场所—认同变得如此有趣，并且如果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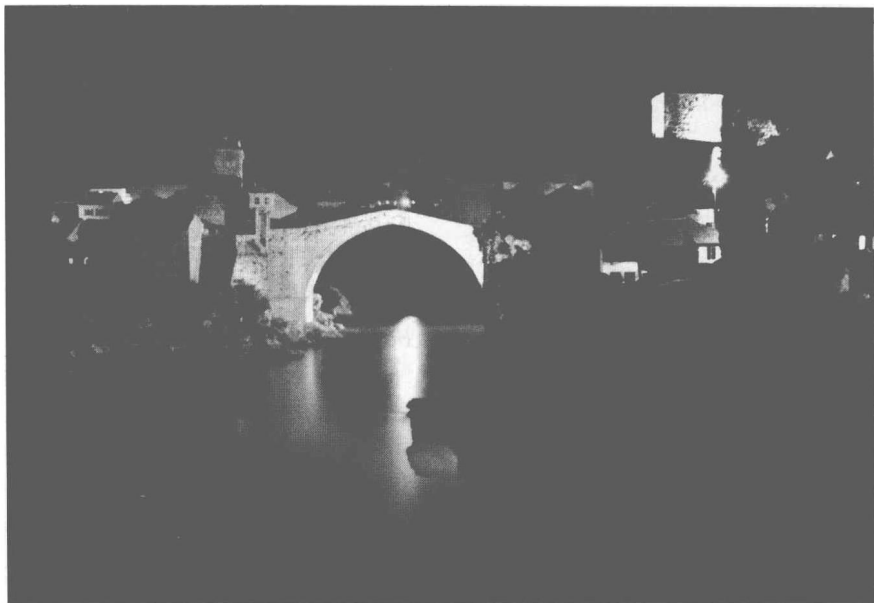


图 0.2 莫斯塔古桥

要规避危险的话，这恰恰是有必要在设计实践中讨论其含义的原因。因而在本书中，我们的目的是在建筑、城镇规划和城市设计中推动就此话题基于实践导向的讨论。

“认同”是一个声名狼藉的宽泛概念，正如詹姆斯·唐纳德（James Donald）所指出的，“‘认同’是当代人文与社会科学中最被过度使用但最少思考的术语。”^[1]依我们的看法，这种不严谨并非弱点。相反，这是为何这一术语有关键理由。保罗·吉尔罗伊（Paul Gilroy）提出：

全然不同的思想被压缩到特性的概念之中，它可以涉及宽泛的议题，在通常无关联的主题和观点之间制造出创造性的连接。^[1]

我们的城市设计实践证明了这一点：认同的概念使设计的议题能够在社会和政治的术语中讨论，人们似乎认为它与自己的日常生活相关。使用者谈及某个场所认同感时，当我们深入其表面之下，我们发现他们的头脑中通常已有某种场所所具有的他们自己的认同方面的意义：该场所如何影响他们构想自身的方式，或者他们对场所的想象如何影响其他人构想他们。两个非常不同的案例可有助于阐明我们的意思。

第一个案例位于波黑的莫斯塔（Mostar）镇，为内雷特瓦河（Neretva River）上举世闻名的古桥^[1]所在地（图 0.2）。古桥在 1993 年克罗地亚人和波斯尼亚穆斯林的內战中毁坏。当地波斯尼亚人随后的

[1] 莫斯塔桥（Stari Most），由土耳其建筑师 Hairuddin 在公元 1556 年奥斯曼帝国占领巴尔干地区时建造。奥斯曼帝国统治这一区域以后，波斯尼亚人普遍开始信仰伊斯兰教，而生活在同一地区的塞尔维亚人与克罗地亚人则分别继续信仰东正教和天主教，从而使这一区域形成天主教、伊斯兰教和东正教三教并立的局面，莫斯塔古桥连接分居两岸的波斯尼亚人和克罗地亚人社区，被视为东西文化交流的桥梁。1993 年 11 月 9 日，在波斯尼亚人和克罗地亚人的內战中，莫斯塔古桥成了民族纠纷、宗教冲突牺牲品，被克罗地亚人炸毁。2004 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资助下完成重建。——译者注

陈述¹²表明桥的突然毁坏如何彰显了它在形成他们自己的个人和社会认同感中所担当的重要作用，达到了完全将桥视为他们自己的一部分的程度：“我的感受和任何真正的莫斯塔人一样……我感到自己身体的一部分被扯掉”，波奈德（Bernaid）¹³说，他是当地人，一辈子都住在莫斯塔。

波奈德作为一个“真正的莫斯塔人”的自我认同感显然与莫斯塔的积极价值相联系，特别是古桥，他与其他莫斯塔人共同享有：古桥“像一个具有非凡灵魂的人那样，有着一个人应有的全部好品格”，这是一位当地妇女艾丽莎（Enisa）的说法。¹⁴然而，从我们自己在破败的英国社会住宅完全不同语境的工作中，我们知道即使是那些一点也不受喜爱的场所，也常常对人们感受他们自己的识别性的方式施加强力影响。

例如，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我们一直和居民共同从事布莱克斯顿（Brixton）安吉尔（Angell）镇的住宅地产重建工作，它们建于20世纪70年代，位于伦敦南部。在20世纪90年代，我们和居民们一起致力于建立引导该地区未来的城市设计策略。作为策略的一部分，我们协助居民们定义他们希望从重建中得到的场所—认同感。这是个冗长而复杂的故事¹⁵，长话短说，和居民代表们关于安吉尔镇的建筑、街道和绿色空间的激烈讨论带来了三种关键场所—认同需求的清晰表达。

首要的想法是在安吉尔镇及其周边环境之间实现最大的空间和知觉关联。其目标是要打破居民和外来者头脑中将安吉尔镇作为一个犹太人聚居区的感觉，那种孤立感——它建立在与其居民的联系上——通过它在形式上有别于其周边环境而显示出来。人们希望和更为广阔的“布莱克斯顿特色”有更大的融合之感，可能具有政

治上赋权的影响，帮助居民从犹太隔离区（ghetto）的社会身份中解脱出来。

居民的第二个要求是重建工作应把场所设计得更“居家”（homely）。讨论澄清了“居家”是作为“体制化”（institutional）的反面来理解的，居民们寻求与非体制化生活相关的历史形式，来支持（并授权）发展非体制化的人的社会认同，能够自己决定他们生活场所的变迁。

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愿望表达在居民的“认同纲领”（identity brief）中，重建的场所应当以“现代”的特性而告终。这里的想法是与现代性相关的形式将授权发展一种社会认同——面向未来，而不是“陷于过去”：作为怀有积极热望的有远见的人，而不是无可救药之人。

这一陈述的要点不在于争论这些需求是否最好地符合了居民利益，也不在于由这些磋商而产生的实际建筑、街道和绿色空间设计是否在实践中支持了认同纲领（虽然现场效果迄今为止似乎广为接受）（图0.3），其目的在于显示出居民场所—认同的需求与他们自己目前和想要得到的身份之间有多么紧密的联系。

总之，从莫斯塔和安吉尔镇，我们都可以看到在场所—认同和人们的个人与社会认同之间的紧密联系，既关乎几世纪之前的工程构筑物，也涉及现代城市的住宅地产，他们位于极不同的文化环境中，一个深受喜爱，另一个基本没有。场所认同和人类认同相互交织是一个经常遇到的现象，或许这有助于解释为何“认同”这个词在日常言谈中同等地涉及场所与人。

然而不幸的是，对建筑师、城市设计师和规划师在这种交织的过程中如何工作显然缺乏有用的理论。例如建筑理论家N·利奇说“建筑理论中几乎没有提到人与建筑的实



图 0.3 布莱克斯顿安吉尔镇的新住宅

际认同方式”¹⁶，这当然没错。然而，在我们能够发展出任何有用的“如何去做”的模式之前，必须形成某种导向实践的关于“如何思考”的概念。

正如莫斯塔和安吉尔镇显示的，影响人们身份建构的不是建筑、街道和绿色空间本身的物理配置，而是它们对人们意味着什么。它依赖于与事件和人为事实(Artefact)有关的被视为再现(representing)。例如在英国民族认同的例子中，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指出：

民族认同不是与生俱来的东西，而是形成和改变于再现之中并与再现相关联。我们仅仅因为“英国性”作为英国文化的一套意义系统逐渐被再现出来的方式，才知道什么是英国的。¹⁷

这对于任何社群的想象成员来说同样正确。但意义的重要性不应仅仅在一个场

所向人们表现为何物方面才被考虑，社会学家斯科特·拉什(Scott Lash)解释道：

城市的表意不是我们坐在电影院里，阅读一本书，听音乐会或看电视时的再现表意。城市只有当我们沿着小径和大道穿越它时才有意义，它不是一个再现，而是整体的环境。在城市以及空间场域中我们比“积极的观众”更加积极，比互联网和CD-ROM更加互动。超越互动性，比互动性更互动的是定居。我们定居或“生活”在城市空间的场域之中。¹⁸

拉什将定居的过程描述为“超越再现，或更恰当地说，先于再现”¹⁹，使整个身体的所有感官都参与进来，所产生的意义源自人类使用模式，以及场所自身的感官联系。这里再次涉及莫斯塔居民的描述，它证明了通过特殊的戏剧化使用方式建立场所经验的重要性，因为古桥和特殊的人类

行为模式具有强烈的关联，和当地人生活事件的重大仪式联系在一起，例如成人礼。对于男人们来说，成人的门槛是在众目睽睽下鼓足勇气从桥上跳进内雷特瓦河中而跨越的：“当你从桥上跳下之时你就知道你是一个男人了”，露西·布莱克斯塔德（Lucy Blakstad）介绍说。²⁰ 对于妇女，有意义的事件是不同的，一位当地 50 多岁的妇女泽拉（Zehra）回忆道：“某种程度上古桥是情侣之桥……我的初吻就在那古桥上。”²¹ 另一位当地妇女雅斯娜（Jasna）也表示同意：“没有一个莫斯塔人不曾在古桥附近做过爱的。”²²

如果我们想想为何古桥是内战破坏的特殊目标，意义在使用与形式方面的重要性同样遭遇了残酷的透明。在使用层面，城镇被河流一分为二，古桥构成了人们穿越其间的唯一自然通路：具有不同历史的人之间的联系，它作为美其名曰“种族净化”的认同—变化策略的一部分必须摧毁。涉及形式本身的意义在这一魔鬼事业中也起了作用：桥的伊斯兰尖拱代表了奥特曼的传统，本身就是所谓的“净化”程序中要被清除的一部分。“净化掉莫斯塔的穆斯林还不够”，一个参加攻击的民兵说，“其遗产也必须毁掉。”²³

总之，在一个场所的结构和开放空间之中定居的多重感知过程产生了一个意义的综合体，其中涉及形式与使用模式，地理学家将那些人类干预下改造的景观称为“文化景观”（cultural landscapes）。如果我们想理解为何场所—认同影响了如此众多之人，那么我们必须一方面着眼于意义和文化景观的联系，另一方面着眼于人们的身份。这就是本书中我们采用的全面视角，将我们带入场所—认同的特殊定义，它成为我们随后章节中思考的基础。对我们来

说，场所—认同就是一系列意义，与任何特定的文化景观相联系，任何特定个人或群体用来建立其个人或者社会认同。

从安吉尔镇的故事中可以看出，居民希望能够以动态的方式召唤当地的文化景观：他们想利用房屋的重新设计来帮助建构复兴的、更有影响力的认同。安吉尔镇的居民并非唯一这样做的。在认同建构的动态过程中，利用文化景观作为意义的关键来源似乎是当今很多人生活中的中心议题。

认同建构的动态本质并非如它有时显示的那样是新现象：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总是存在一种建构人们自身认同的需求，而不只是作为一个施予物被动地接受。当然建构过程很久以来就明显具有流动性，例如任何地方的传统宗教观中，人类被上帝的想象所塑造受到科学发展观中人类从类人猿演化来的挑战，同时也是那些科学思想提供了攻击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的方法，它炸毁了所有方面传统的确定性。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历了早期工业化过程的愉快与恐惧，他们写道如何“所有固定的，快速凝固的关系……都一扫而空……所有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²⁴ 稍晚些时候，德国哲学家尼采看到文化景观卷入了这一新的流动性之中的认同建构过程。他写下了对新的设计方法的需求，感到人们不再满足于传统的建筑和室外空间，因为“我们想看到自己转译为石头与植物，当我们围绕着这些建筑和花园闲逛时，我们想要在我们自己里面散步”。²⁵

整个 20 世纪，不断深化的科学研究水平还在进一步侵蚀已经确立的认同之源，它基于以前的确定性。例如，人类本质上有别于自然的认同过程经历了剧变，正如阿德里安·弗兰克林（Adrian Franklin）指出的：

自然的概念近年来已经充分改变了，从一个外在于并且不同于人类与文化的独立现实，转变为一个越来越依赖于全体人类社会运转的领域，并在其中成形。²⁶

从更为广阔的视角看，人类也将以前概念上的宇宙中心位置连根拔除了。J·基洛特 (John Gillott) 和 M·库玛 (Manjit Kumar) 认为：

科学永远地改变了人类对在宇宙中位置的感知。从前是宇宙中心的一个身体定居者，宇宙的其他部分围绕着他旋转，现在我们将自己视为一个微小行星的居民，围绕着一个普普通通的星球旋转，在银河系的边缘，它还只是无数其他星系中的一个。²⁷

与这些转变相并行，认同建构过程的流动性进一步增长，因为核心价值的变化支配了很多人的生活。社会理论的各种不同领域中的思想家们都认为在这些价值变化中，最为重要的是选择在日常生活中与日俱增的重要性。例如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 (Zygmunt Bauman) 告诉我们，如今选择是“最高价值”²⁸，而 F·英格里斯 (Fred Inglis) 以文化研究的视角将选择称为“以目的和认同来满足消费者的关键道德行为”。²⁹ 选择的重要作用甚至反映在定义贫困的新方法上，V·库尔蒙 (Violaine Courmont) 报导说：

2000 年世界银行报告从物品（金钱的或是生活必需品）的匮乏开始，一直讲到选择能力的不足，选择的可能性被认为是幸福的基本要素。³⁰

选择在如此众多的人们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对于认同建构过程具有复杂而矛盾的含义。一方面，选择是最高价值，选择一个人自己的身份——在认同问题上暗示了一种极端的流动程度——似乎很受重视，至少对于某些人在某些时候是这样的。A·R·斯东 (Allucquère Roseanne Stone) 在此方面强烈地感到愉悦感：

我倾向于将自己视为一个实体，选择用认同的游戏制造自己的生活经历。有时看似我过去的一切都是一种延伸的托辞，为了用主体的地位与相互作用来实验。毕竟，还有什么材料比用一个人自身来实验更好吗？³¹

某些种类的文化景观比其他的更好地支持以主体地位与相互作用来实验的愿望，在此需求针对的是为大范围不同行为模式和文化诠释的选择提供开放潜质的地方：这类地方常常被称为“共鸣的”。³² 然而，共鸣并非全部：这一特殊硬币还有其另一面。甚至实验性如 R·斯东的人仍会感到在认同方面某种对稳定性更深切的感受：

说任何主体的地位是一种面具并不一定就开辟了新天地。那样不错且有益，但大多数人仍认为一些主要的主体地位是理所当然的。当他们受到压力，可能会对此概念口是心非，甚或他们现在的“根本”角色也是一个面具，但没有人会真正相信。对于所有的目的和意图，你的“根本”角色就是你。除此之外，空无一物。³³

在现今的情况中，选择是“最高价值”，“关键的道德行为”和“幸福的基本要素”，然而一种稳定的“根本”认同的建构并非

易事。人们想在其生活尽可能多的方面操练选择,包括有必要选择他们的选择标准。这潜在导致了选择的永劫回归:一种关于怎样选择的选择方法的选择,如此这般,永无休止(ad infinitum)。这种状况不会为感受任何特定选择带来有坚实基础的基本价值。但感知总会莫名其妙地产生:无知无觉(senselessness),它牵涉到“关键的道德行为”,在心理学上却永不可行。

选择的显赫地位在事实上的认同建构过程中既鼓励着自由也产生了恐惧。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在他最著名的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³⁴(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中如此诗意地表达了它所制造的内在紧张。如今,认同的建构部分依赖于找到恰当的心理重量来平衡轻之愉悦,以防自我全然飘向虚无。在选择的最高价值下,这种重量唯有通过选择和试验的试错过程来获得,齐格蒙特·鲍曼解释道:

因此人们总是需要再试一次,然后再来一次——唯有如此尝试,绝望地死死抱住坚固和有形的事物,以及它们所允诺的永生。³⁵

或许我们从此开始洞悉为何在认同建构过程中,文化景观看起来具有如此特别重要的影响,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它们由持久的建成或自然形式构成,芬芳弥久,适合于被“绝望地死死抱住”,无与伦比。

莫斯塔的案例表明古桥为人们的生活贡献出的永恒感,彻底显现于其毁坏之时的痛失感。当地人埃米尔(Emir)觉得“痛失古桥就像你从宇宙中拿掉了几颗行星一样”。³⁶一位当地妇女艾丽莎在战争中失去了亲密的家庭成员,用更加不寻常的语言

表达了她对同样话题的感受:

我可以以某种原因接受战争中母亲和丈夫的死。人们死去,消失……但不是古桥,1566年它就建造了,在这儿呆了这么多年。³⁷

文化景观特别适合用来满足永恒感,它使根源稳固,反转时而令人愉快的“存在之轻”的“不能承受”方面。但仅仅是恒久性自身并不能带来当今认同建构过程中,由流动性滋生的更深入的话题。正如齐格蒙特·鲍曼所言:

人们必须选择,却没有得到正确选择的简单诀窍……既然在美好与邪恶之间的分界线并不存在,要经过行动过程而绘制出来,那么这些绘制界线的努力结果就类似于一连串的足迹,而不是一个绘制好的道路网络。因而孤独就像共鸣之屋中的定居者那样持久而难以排遣,这是一种矛盾心理……当孤独无法得到缓解与平息时就会极度痛苦,难以忍受。³⁸

处理这种痛苦的孤独感,同时使人们的选择在基本价值缺席的情况下仍有意义,一种办法就是把自己看做一个更大社群(communitiy)的一部分,其中别人也和自己做同样的选择;这样人们可以通过社群其他相关成员的认可而使自己的选择有效。文化景观在能否培养这一社群成员感受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然而我们开始研究这种作用之前,必须先在这一语境中更深入地探究社群概念本身。

面对无知无觉的威胁,社群成员的全部要义是它想要使人们的选择生效。然而,既然选择是最高价值,那么这种生效

的达成就不能以压制人们的选择为代价。我们期望我们认识的社群成员总是赞同我们做出的任何选择。当然，实际上，生活从来不会这么简单：这些是仅存于头脑中的社群，社会学家B·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称之为“想象的社群”。³⁹例如谈到民族，安德森指出，它们都是“想象出来的，因为即使最小民族的成员也从不会认识他们的大多数同胞，不会遇到他们，甚至不会听见他们说话，而他们共有的幻象存活在每个人的头脑中”。⁴⁰在一个选择是最高价值的社会中，这种想象的社群的成员资格非常重要，是多数人认同的中心。

在复杂的现代社会，多数人把自己看做几个想象社群的成员。其中有一些相对稳定而持久，就像安德森上面用作例子的民族国家，或者和人类生活的核心尺度联系在一起的其他东西，比如种族划分，性别或在生命周期中的阶段。相反，另一个极端是相对“浅薄”而短命的事物，比如包括所有方面的时尚牺牲品。在所有层面上，甚至最浅薄的层面，任何想象社群的成员都需要一种对于社群“现实性”的信仰元素，鲍曼指出：

相信他们在场是唯一的砖和砂浆，而归咎于重大价值是他们唯一的权利之源。对于寻求赞同的个体的决定，一个想象的社群被授予了仲裁权，并且允诺和仲裁紧密相关，获得了赞同或不赞同的权利（当然，自始至终，人们必须确信这种颠倒的顺序是使整个事件运转的理由）。⁴¹

这里信仰的因素位于想象社群的成员使无拘无束的选择生效之途的中心：如果有任何假装的因素，生效的过程就无法起作用。这意味着社群自身的存在必须被“识

别”为真实的，先在于人们自己的成员身份，而不仅仅是被发明出来使自己的选择生效的东西。

想要将想象的社群识别为先在于人们自己成员身份，必须基于某种令人信服的“证据”。“真实”世界中围绕我们的先在事件和人造物就必须作为证据来理解，证实了想象的社群“真的”存在，我们没有“虚构”。我们环境的所有方面，从音乐、服饰到旗帜和城市形态，都能够潜在地作为确认某一个想象社群预先存在来诠释，但当前在我们大多数人所共有的典型的想象社群范围内，特定的方面在不同的“深度”上具有特定的意义。

由于越来越快的时尚循环与今日经济体系的纠缠，围绕我们的种种方面，如服饰、音乐和装修饰面，相应都可以任意使用，短命无常。这意味着从中读出的意义大多只适合于我们最“浅薄”、动态、短暂的社群建构。相反，文化景观的相对恒久——特别是所有潜在的社群成员都有权进入的公共空间——能够用来建构最稳固，最“深入”的想象社群类型，它关系到我们自身认同的某些最稳固、最深刻的方面。

人们担心对场所的过度聚焦可能会形成危险的民族主义认同感，他们有时提出文化景观在今天已经不再是认同建构的恰当材料。例如N·利奇提出，我们现在处于一个“较少通过场所的概念来建立认同的年代，如家乡、出生地等；而越来越多地通过短暂的现象，例如工作和财产”。⁴²然而不幸的是，不是每个人都平等地赋予了选择工作和财产的能力，许多人——即使在想象中很富裕的社会——也很难识别他们生活在，如里奇所说的，“一个不断变动的社会，其空间原型是交通换乘点和机场大厅”。⁴³

任何情况下,我们仍必须面对T·布洛克兰(Talja Blokland)提出的问题,她提醒道,“我们发现当代社会鼓动不断寻求这一问题的答案:如果在日常与别人的接触中我们不断发现新的差异,那我们属于哪里?”⁴⁴或许最近的研究发现认同的形成中利用文化景观仍然很重要,才不可避免地需要投入这一问题,即使对于新世纪旅行者^[1]那样真正的游牧者来说也一样。例如K·海瑟灵顿(Kevin Hetherington)告诉我们,这里提到的景观是“象征着不确定性、矛盾感情和边缘性的场所。这样,它们就被当做了象征处在社会边缘的外围群体的中心”。⁴⁵“像这些地方,比如史前巨石阵(Stonehenge)^[2],代表了一个象征场域,从另类到主流的各种身份在其中被激活与生产。”⁴⁶

总而言之,对于设计者,不接受想象社群成员的认同过程似乎不太现实,它至少部分超越了交通换乘点和机场大厅,参照文化景观来建构,对许多人一直都很重要。出于同样原因,设计者在工作中难免改变更为广域的文化景观,有必要在认同暗示上担负一定的责任,接受这一点是明智的。

总之,想象社群的自我认同过程是一种强大的策略,来对付选择的永劫回归所特有的疼痛的孤独感,而不会输掉选择本身;无论财产和其他个人所有物的重要性如何,想象社群的持续建构至少有部分涉及场所的概念。A·M·富蒂艾(Anne-Marie Fortier)提出,

想象的社群既是一个团体的共同历史、经验或文化——团体的财产——所创造的,

也是关于想象的社群如何附着于场所——文化的定位——之上。⁴⁷

任何情况下,场所也是团体的“共同历史、经验和文化”的一部分:利奇有过如此优美的表述,“相关行为的记忆如幽灵萦绕于建筑之上”。⁴⁸

当利奇那样的论者指出这种萦绕可能有问题时,他们当然没错,部分因为当前任何场所都可能成为视自己为不同的想象社群成员的人之居所,这些人带有不同的价值和身世。这一情境在世界上很多地方变得愈加复杂,设计者面对的是很困难的议题。关键问题在于任何社群都至少在某种程度上通过与他者的区分来界定:我们成为“我们”,因为我们并非“他们”,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人们永远无法避免这种区分,因为它天生就是认同建构过程本身的一部分:“他们”的概念居于我们第一眼识别“我们”的过程之中心。即使我们把“我们”看做整个人类,也不可能最终免除和某些“他者”的区分——机器,“荒野”或随便什么东西。“非常奇怪”,J·克里斯特娃(Julia Kristeva)说,“局外人生活在我们内部:他是我们身份的隐秘面孔”。⁴⁹

很清楚,在某些情况下,任由这些我们/他们之间的差异通过文化景观或其他方式的发展,会带来可怕的负面后果。差异的感知和其他紧张状态的互动太简单了,将带来极其恐怖的结果;就像我们在莫斯塔看到的“种族清洗”,或者在更大的生态圈中,人类发展的冲击对全部物种的破坏。

至于在人类领域,法国社会学家A·图

[1] 新世纪旅行者(New Age Traveller),指英国一群带有嬉皮信仰的人,在音乐节之间旅行,为了在和其他具有类似信仰的人组成的社群中生活。其交通工具和住房包括有篷货车、卡车、公共汽车和敞篷车改造成的汽车住宅。他们大量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早期的,如今已渐趋式微。——译者注

[2] 指位于英国索尔兹伯里的史前巨石阵。——译者注



图 0.4 巴黎阿拉伯世界研究中心（建筑师让·努韦尔）

兰（Alain Touraine）指出，让来自不同的想象社群的人们“生活在一起”，关键是首先要发展一种对他所说的“主体”的相互尊重⁵⁰；努力建构使生活有意义的认同，让所有人都无可避免地参与其中，无论一个人自己的身份和别人的有多大差异。在以自身为目的的认同建构过程中，对其价值标准的尊重高于一切，要求特殊类型文化景观的支撑。它强化了对场所共鸣的需求，可以为广泛选择不同的行为模式带来开放的可能性，也能够支撑对一系列不同想象社群恰当的文化理解。

在今日的多元文化社会，共鸣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德国哲学家W·维尔施（Wolfgang Iser）所称的“跨文化性”。一旦我们重视跨文化性，就会特别强调我们对所有物理尺度的场所的思考方式。例如在较大的尺度上，我们倾向于同意T·布

洛克兰的观点：“邻里并非永远不能成为一个社群。相反，作为一种手段，它服务于实际的和象征的目的，形成许多不同的社群并使之永存。”⁵¹在较小尺度上，我们可以举让·努韦尔（Jean Nouvel）的巴黎阿拉伯世界研究中心（图0.4）的例子为参照，来理解维尔施的跨文化性：

努韦尔通过形式的操作来激起一种欧洲文化和亚洲文化接触的深厚感情，可以被理解为高科技文献和阿拉伯装饰的一体化。功能与装饰以一种惊人的方式相结合，可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⁵²

对设计者来说，跨文化性难于在始终如一的基础上着手，因为它有赖于对一系列想象社群的理解和感受，它们均有别于设计者自己，不是当前设计文化中惯用手

段的一部分。毕竟,想象的社群仅存在于其成员的头脑中:“每个人的头脑中都留有他们团体的图像”,⁵³ B·安德森的话被一再引用。尤其是,这一“团体的图像”就像所有的社会结构一样存在于人们的记忆之中,正如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所说的,在“富有见解的个体的记忆轨迹”之中。⁵⁴然而,记忆的社会共享(或非共享)是设计者的雷区,有可能支撑一个想象社群的任何特定的形式或行为模式的相关记忆,对另一个来说同样很容易显得毫不相关甚至是敌对的。让事情变得更加复杂的是,职业设计师自己——仅仅通过是职业设计师这一美德——就常常感受到某种他们自己的“设计社群”和自己的重要记忆。建筑师S·安德森(他和B·安德森没有任何关系)指出,实际上这对于建筑作品的自治是必须的,但它也带来问题,导致“职业记忆”有可能与其他每个人的“社会记忆”有很大不同。⁵⁵面对这种普遍性问题,看来想要在设计中产生出彻底的跨文化性,就要让设计过程本身形成新的、更加开放的协同创造途径,视使用者为他们自己的社群价值方面的合作专家。⁵⁶

维尔施将阿拉伯世界研究中心的跨文化性与他所说的“总是处在难以忍受极限,在陈腐的‘自属性(ownness)’的向度上倒行逆施”⁵⁷相比较。这种“倒行逆施”内在于很多受到好评却是单方面的努力,它们坚称在相关的场所中,新的建设要“为保护而保护”(keeping in keeping)任何既存的事物,以此来维持现有的场所—认同,偏狭得到了鼓励,因为它滋生出过去一定比未来更好的观点;这相应地又鼓励了F·弗雷

迪(Frank Furedi)所说的“恐惧的文化”,经常受到媒体的夸大宣传,很多人以“知足常乐的道德”来行事,将他们自己视为生活在一个“危险的陌生人之世界”⁵⁸中,在那里恋爱是危险的,甚至一个诸如握手这样的友好手势也会构成健康危险。

近期的城市变迁也深涉于这种恐惧的文化的进展之中。J·R·肖特(John Rennie Short)的解释再次强调了公共空间在认同形成过程中的关键作用:

在美国,弥漫着对他人的恐惧感某种程度上可以归因于城市形态,它意味着人们很少能在公共和第三空间中遇见与他们不同的人。当我们被隔离,进入了生活经验的分离空间,我们唯有通过媒体的陈词滥调和白日梦才能遇见他人。当我们失去了允许我们亲眼看见别人的共享空间,我们也就失去了一个真实市民社会的基本要素。⁵⁹

当普遍化的对“他人”的恐惧表现在经济领域中时,甚至在相对富裕的社会,它也通过时常称作可得经济资源“零和”(zero-sum)^[1]的概念造就了想象社群之间的紧张关系:因为资源供应总量是有限而固定的,它支持如果“他们”得到很大改善,“我们”就必定所得甚少的悲观主义观点。正如政治思想家E·盖尔内(Ernst Gellner)指出的,解决这种紧张状态的任何有效途径都要求在其他事物中,认同导向一种更加乐观的“非零和”的未来观:如果“我们”和“他们”一起工作,那么未来我们都能做得更好。⁶⁰如果文化景观有助于发展这些更加乐观的、前瞻的身份,

[1] 零和是一个经济学的词汇,指的是指参与博弈的各方,在严格竞争下,一方的收益必然意味着另一方的损失,博弈各方的收益和损失相加总和永远为“零”,双方不存在合作的可能。——译者注